

如何让乡村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熊丙奇



第35个教师节到了。近日，教育部就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近年来，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其中，教师工资福利支出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已连续多年超过50%。教师工资由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全国19大行业排名第7位。

怎么得到排名第7的？依据是什么？最大的依据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在去年8月31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介绍，2017年和2012年相比，整个教育行业工资收入增幅是74%，其中公办中小学在岗人员2017年平均工资(税前)大概是8.2万元。

记得当时，对于这一平均工资水平，就有很多教师感慨自己是“被平均”，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教师的待遇一样，农村地区教师和城市教师一样，就都“觉得”教师有钱了。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我国乡镇教师、乡村教师的月收入已经在逐渐提高，2016年分别达到3965元和3550元。注意，3965元，是已经逐渐提高的结果，也是平均数。这意味着乡镇教师的平均月收入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低2000元左右，而乡村教师收入的低位数，就更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低得多了。

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当前确实需要推进乡村教师待遇倍增计划。需要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也是下一步推进义务教育省内均衡，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的必然选择。

问题，服务乡村振兴。而在2015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葛剑雄提出，农村教师的待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给农村教师一点津贴就够了，而应该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这样大学毕业生才可能抢着去农村当老师。

按照全国一线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和乡村教师的平均收入水平，代表、委员的建议是靠谱的，只需让乡村教师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再略微倾斜即可。

毋庸置疑，我国特别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正在花大力气补上乡村教师这块短板。但是，由于乡村教师待遇基数低，增幅很大的待遇提高，其实并不高。比如，根据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情况的通报》，截至2016年底，共有684个县已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惠及8.1万所学校的129.5万名教师，学校和乡村教师的覆盖率分别为98%和96%，比2015年分别提高2%和4%。2016年，各地共投入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资金44.3亿元，比上年增加9.9亿元，增幅28.8%。中央核拨奖补资金29.8亿元，比上年增加7亿元。人均补助标准为284元，比2015年增加22元。这样的补助标准，对于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来说，只是“一点点”，难以构成吸引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针对乡村教师，意见特别提到，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生活。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策，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标准，努力惠及更多乡村教师。

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当前确实需要推进乡村教师待遇倍增计划。当然，落实这一计划，仅靠地方财政是很难的。尤其是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部分)主要还由县级财政保障，要让县级财政拿出一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来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是不太现实的。这就需要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也是下一步推进义务教育省内均衡，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的必然选择。

不认同留守的身份和角色不是问题。在调查中，有个判断是留守大学生“角色认同有困难”，即“相当一部分留守大学生还难以接受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他们还存在着角色认同的困难，农村留守经历带给留守儿童的创伤和阴影并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功获取了大学受教育机会而自动消失或被抚平”。笔者就此产生强烈的疑问：为何一定要认同曾经留守儿童的身份和角色？为何不认同成了一个问题？有个常见的心理现象叫“心理暗示”，指人的心理会受他人或自己的观念、判断、态度等影响，甚至能让人按暗示的方向来实现自己，从而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特质变得非常突出。据此，将留守经历引导为一种创伤和阴影是负面的心理暗示。首先，留守经历并不是农村青少年的全部经历，其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与父母的分离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影响，但是不能暗示他们将曾经的留守作为一生的伤痛。其次，留守中与祖辈的隔代陪伴等是有温情的，如果一味进行负面暗示，忽视了隔代照料中“留守老人”的贡献，也会造成他们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视为创伤的转化，从而使留守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为青少年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认同本身不是关键，造成留守的原因才是。

对留守的过分强调放大了原生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表现原生家庭决定一个人成长的现象级电视剧，甚至将原生家庭作为其成长的“原罪”。这种文化生产迎合和助推了当代人对“拼爹时代”阶层固化的焦虑和恐慌，对留守经历的强调也是此类文化的表现。不可否认，阶层间自下而上的流动在当下变得艰难，但对留守的过分强调将这一困境的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体家庭上，即留守青少年的父母身上，从而弱化了个体的能动性，强化了父母的愧疚感和青少年被亏欠的心理，加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因而无法在情绪发泄和代际矛盾中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即资源分配不公进行更深入地反思和批判。

留守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对留守的关注不能简单地地为有留守经历的人贴标签，强化留守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对留守问题的反思要更深入地挖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不应加深留守少年儿童原生家庭的内部矛盾。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发：nmrbpinglun@163.com

征集启事

扶贫切莫“排排坐、分果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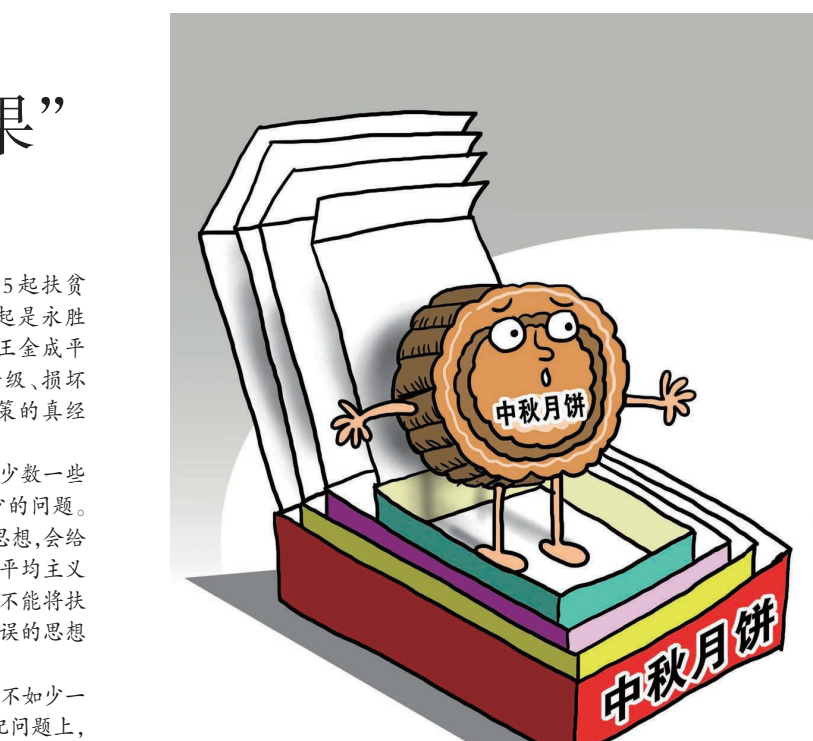
王度阡

近日，云南省丽江市纪委监委通报曝光5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永胜县程海镇兴仁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平均分配农村危房补助资金问题，不论危房等级、损坏程度，一律搞平均主义。把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真经“念歪”了，王金成也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扶贫领域出现搞平均主义的现象，反映出少数一些扶贫干部在工作能力、责任担当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不可否认，少数群众确实存在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会给政策落地造成一些阻力，但党员干部不能依着平均主义的思想来办事。一些扶贫干部能力不足，不但不能将扶贫政策向群众讲深说透，其行为反而被一些错误的思想牵着走，最终导致政策跑偏了、真经“念歪”了。

出现上述问题，源于少数扶贫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作怪。在扶贫政策落实、资金分配问题上，本应该坚持工作原则、把握政策方向，而有的干部懒得干事、不愿操心，怎么简单怎么行、如何方便如何干；有的干部想当然，把扶贫工作简单化、机械化，扶贫对象“排排坐”，扶贫资源“分果果”；还有的干部认为分配权在自己手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政策要求、群众利益全然不顾。凡此种种扶贫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既没有让扶贫政策发挥应有的效果，更会导致贫困群众对扶贫工作产生质疑。

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扶贫政策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扶贫干部多花时间琢磨、多费心思讲解、多下功夫落实。把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个扶贫对象身上，有的放矢，才能成其事、收其效。



据媒体近日报道，在礼品销售过程中，一些商家过度注重商品的“金玉其外”，但是过度包装不但变相地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还产生了大量本可避免的垃圾，增加了垃圾处理的成本，造成资源浪费。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从源头上减量，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限制月饼过度包装的专项整治活动，给月饼包装做“减法”，回归“自然”。这正是：明月照人吃月饼，一层一层拆不停。过度包装做“减法”，提高质量显美名。文 @十八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进城补课不是农村教育焦虑的重点

柯利刚

今天的玩乐，以课堂为载体。换一个角度，如果城里的孩子不学习一些课程，那这个时间会用来做什么呢？多半的孩子会捧着手机玩游戏。玩游戏和补课之间，我相信，天下家长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另外，补课是一个过程，有过程就有结果。有一个客观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一届在补课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综合实力远远领先于他们同龄的祖辈和父辈。站在文明发展的角度，这到底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还是一个令人焦虑的结果呢？

其次，进城补课有以偏概全之嫌。笔者相信，村里娃进城补课的现象，肯定是有，中国这么大，基本上什么现象都有，但这是普遍现象吗？据新闻报道，去城里补课的村里娃，要么城里有亲戚可以投靠，要么本身就住在城郊村，所以有去城里补课的条件。客观说来，有这种条件的家庭和村庄少之又少，多数村里娃其实并不具备进城补课的条件。笔者相信，较之于中国几千万的留守、流动儿童，这些进城补课的村里娃，少到不好意思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

此外，焦虑“下沉”有概念偷换之嫌。农村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补课，原因是什

么？有人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教育焦虑，而事实上，一些农村家长，是因为重视教育，才把孩子送到城里补课的。重视和焦虑，虽然可以促成进城补课这个共同的结果，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焦虑的家长主要看到，如果不这么做都有哪些好处。因为焦虑而选择补课，只会给自己和孩子增加无形的压力；因为重视而选择补课，则会给自己和孩子增添无穷的动力。

笔者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师范大学就读，身边的同学、朋友多半在教育系统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交流，深知“教育焦虑”是一个被过度放大和渲染的词汇。笔者也是从农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城市里来的，现在也仍然有很多发小、朋友生活在乡镇，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有机会去城里补课，新鲜和激动都来不及呢，哪有时间焦虑？

农村娃进城补课，这么做的人很少，知道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多，大量效仿以至形成潮流，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概率事件。所以，这件事情，绝对谈不上是农村的教育焦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定教育焦虑这个词。教育焦虑，是客观存在

的，不但城市有，农村也有。只不过农村教育真正的焦虑，并不是农村娃进城补课，而是农村娃进城读书，是城乡之间巨大的教育鸿沟。

今年的这个暑假，老家几个发小忙得够呛。为啥？因为在县城买了房。为啥买房？因为“自己可以到村里上班，但孩子必须到城里上学”。这不仅仅是笔者几个发小的认识，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家长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使得县域教育呈现出“城挤、乡空、村弱”的格局，这也是乡村学校“人走楼空”的原因，同时还是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农村上学，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在县城上学，班级实在过于膨胀。这才是农村家长学生面临的最真实、最主要的教育焦虑。

所以说，农村娃进城补课，不必过度焦虑，如果真要焦虑，就焦虑一下农村娃进城读书这件事。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笔者以为：很多难题难以破解，焦虑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破解之道。为什么呢？因为适当的焦虑有利于催人奋发。站在这个角度，笔者倒是乐意看到，能有更多的人，为农村教育面临的真实问题焦虑。

刚刚结束的这个暑期，部分农村孩子的“第三学期”相当繁忙，村里的到镇里，镇里的去区里，区里的赶到城里补课。一个暑假下来，进城补课给部分农村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有一种观点以为，农村娃进城补课，是教育焦虑蔓延到农村的表现。这种观点，其实包含了两个主要的侧面：第一，城里娃补课过多，导致教育焦虑；第二，农村娃进城补课，是教育焦虑“下沉”的表现。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城里的教育焦虑有过度渲染之嫌。城里的教育焦虑，肯定是有，很多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上，也基本上是事实。但并非所有的补课都是负担，诸如美术、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其实都是“很好玩”的。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没有玩乐的时间，其实不完全对，而只是玩乐的对象和方式，在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玩乐，以田野为载体，

「留守」不是分析问题的万能标签

纵横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篇关于“留守一代进入大学后”的调查报告。调查对象是“留守大学生”，调查内容包含学习成绩、能力发展、自我概念三个方面。调查结果发出后引起诸多讨论，微博上对“农村留守大学生”话题的阅读量达2500多万。

笔者同意调查者关注留守大学生并呼吁教育公平的立场，承认这一调查研究的价值，并无意对调查结果进行评价。但笔者想从“留守大学生”这个称呼入手，思考“留守”是否已经成了分析农村青年儿童问题的万能标签，以及“留守”的负面效应被放大的陷阱。

万能的“留守”有先入为主给农村青年儿童贴标签的趋势。农村留守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一些人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夸大处理。表现之一是对一些人来说，短暂的留守经历可能并没有带来很大伤害，但很多过分悲悯的人高高在上地将其视为一种创伤体验。其次，“留守”可以和大学生结合，那么留守也可以和非大学生等任何有过留守经历的人进行结合。这样，“留守”成了一个万能的标签，一旦贴上，被贴的群体便成为一个“特殊对象”而被过分强调，从而强化了留守的经历和负面影响。再者，“留守”已然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心理学上有种现象叫“晕轮效应”，也即光环效应，本质是认知上以偏概全的偏误，指认知者对某人的一些特征形成一种印象后，便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对有留守经历的人，人们大致会有两种极端印象——他们要么是孤僻、不善与人合作的问题少年，要么是独立、乐观等积极向上的人。并且在判断他们时，会先入为主对其进行极端化想象，而且往往先有第一判断，并抱着同情和悲悯的心态去看他们。如果对方没有符合预期，便立马将其视为第二种人，将其视为普通人反而成了一种困难。其实，有过留守经历的人是多样的，留守儿童也并非全然等同于弱者，不必用来满足一些人的优越感和道德感，在关注他们的时候不能将他们视为铁板一块而忽视了他们的其他经历和身份。

不认同留守的身份和角色不是问题。在调查中，有个判断是留守大学生“角色认同有困难”，即“相当一部分留守大学生还难以接受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他们还存在着角色认同的困难，农村留守经历带给留守儿童的创伤和阴影并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功获取了大学受教育机会而自动消失或被抚平”。笔者就此产生强烈的疑问：为何一定要认同曾经留守儿童的身份和角色？为何不认同成了一个问题？有个常见的心理现象叫“心理暗示”，指人的心理会受他人或自己的观念、判断、态度等影响，甚至能让人按暗示的方向来实现自己，从而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特质变得非常突出。据此，将留守经历引导为一种创伤和阴影是负面的心理暗示。首先，留守经历并不是农村青少年的全部经历，其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与父母的分离确实能给他们带来影响，但是不能暗示他们将曾经的留守作为一生的伤痛。其次，留守中与祖辈的隔代陪伴等是有温情的，如果一味进行负面暗示，忽视了隔代照料中“留守老人”的贡献，也会造成他们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视为创伤的转化，从而使留守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为青少年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认同本身不是关键，造成留守的原因才是。

对留守的过分强调放大了原生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表现原生家庭决定一个人成长的现象级电视剧，甚至将原生家庭作为其成长的“原罪”。这种文化生产迎合和助推了当代人对“拼爹时代”阶层固化的焦虑和恐慌，对留守经历的强调也是此类文化的表现。不可否认，阶层间自下而上的流动在当下变得艰难，但对留守的过分强调将这一困境的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体家庭上，即留守青少年的父母身上，从而弱化了个体的能动性，强化了父母的愧疚感和青少年被亏欠的心理，加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因而无法在情绪发泄和代际矛盾中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即资源分配不公进行更深入地反思和批判。

留守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对留守的关注不能简单地地为有留守经历的人贴标签，强化留守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对留守问题的反思要更深入地挖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不应加深留守少年儿童原生家庭的内部矛盾。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发：nmrbpinglun@163.com

新农言